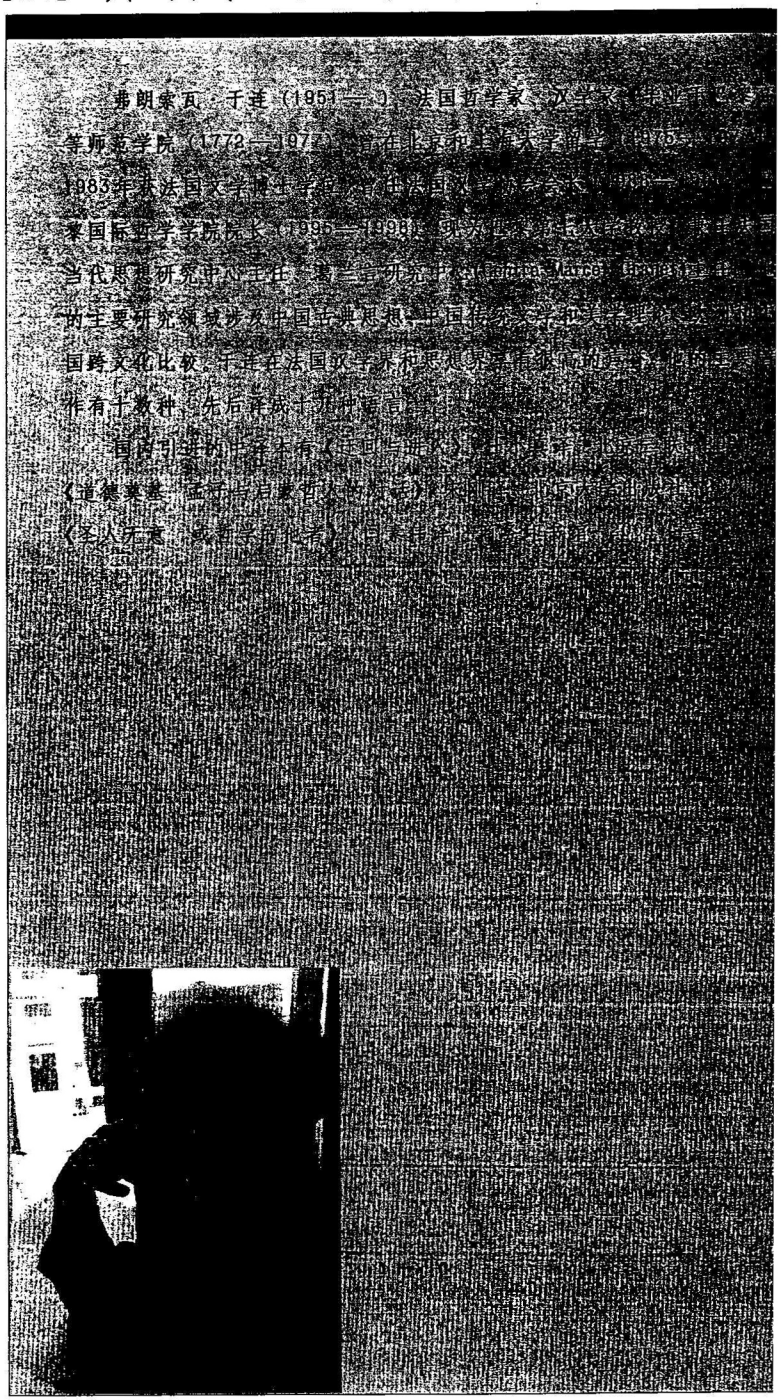
[法] 弗朗索瓦·于连



建议，或关于弗洛伊德与鲁迅的假想对话*

[法] 于连 (François Jullien) / 讲演
[法] 马尔谢斯(Thierry Marchaise) / 整理
张晓明　方琳琳 / 译

一

按照惯例，今晚，我们首先要相互致意。因此，我先向在座的诸位表示问候，同时向大家简要地讲述一下我对中国的借鉴情况，以及我所说的中国与精神分析和——更广义地讲——欧洲思想**不相干**(indifférence)的含义。然后，我将试着从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——倘若这样说不为过的话。不是——尤其不是进行中国思想与精神分析的对比，而是一方面试图探究中国思想中抵制精神分析的成分；另一方面试图——仍然借助于这一探究过程——找到中国思想中反过来能够对精神分析实践的某些方面与时刻，甚或是理解精神分析实践所需要的某些条件进行阐释的成分。

那么，我首先回到我的老话题：对我而言，中国主要是提供了一个理论契机(commodité théorique)。借助这个契机，我将欧洲思想拉向远方，同时为其找到了一个外在点(point d' extériorité)，也得以相隔一定距离来评价我自己的思想。我之所以继那么多人之后，有一天“抵达”了中国，绝不是受了距离（异国情调）的诱惑，而仅仅是因为中国在我眼前显现出一些具有**根本**外在性（extériorité）的前提，它们使中国具有了唯一性：一方面是语言的“根本”外在性，因为中国正是借此脱离印欧语系的；另一方面是历史的“根本”外在性，因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或者希伯来世界不同，她在没有西方参照的情况下已经发展了如此之久。中国使我们隐约觉得她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而能够解释这种唯一性的，最终在于她提供给我们一个与我们本身的思想世界在阐述、注释与文本化方面同样发达的思想世界。这一点，帕斯卡尔以他的名言作了绝妙的概括：两者之中哪一个更为‘可信’呢，“摩西[1]还是中国”？

因此，正如你们所见，我从中国获得的借鉴是启发性的——并不真正具有系统性（其中不明晰之处太多了），而是具有**策略性**。对此，我们可以这样粗略地阐述一下：我经历着无休止的迂回（我不停地阅

* 本文译者在翻译某些涉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言论的内容时，参考了周泉、严泽胜、赵海强三位学者翻译的《精神分析导论讲演》（弗洛伊德著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）一书，在此表示感谢。—— 译者注

1. 摩西（公元前13世纪），圣经人物，以色列先知，古希伯来人的领袖。—— 译者注